

农民学丛书

农民经济组织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А. 恰亚诺夫 著
萧 正 洪 译
于 东 林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农民经济组织

A. 恰亚诺夫 著
萧正洪 译
于东林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А Чаян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 1925

根据莫斯科合作社出版社 1925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经济组织/(俄)恰亚诺夫(Чаянов, А.)著;萧正洪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
(农民学丛书/陈越光主编)
ISBN 7-80109-101-9

I. 农… II. ①恰… ②萧… III. 农民组织;经济组织-研究
IV. F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200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丰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1 千字 印张:9.625

印数 1001—3000 册 定价:14.5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农民学丛书》编委会组成：

顾问：杜润生 于光远

主编：陈越光

执行主编：秦晖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立平 孙达人 刘志伟 李根蟠 陈支平 陈吉元
陈启能 陈越光 陆学艺 郭松义 姜义华 秦晖
董凯忱 翟新华

外籍编委：

B. Galeski(波兰) 黄宗智(美国) 滨岛敦俊(日本)

T. Shanin(英国)

《农民学丛书》总序

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方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世界上仅仅7%的“非农民”！连小学生都知道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然而很少人注意到全球23亿农民中，我国农民占了9亿，即近2/5。当然，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但如果说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 或 Cultivator）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可能低于此数据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而言，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则无疑要高于此数据。在后一个意义上，说世界农民中的一半甚至更多都是炎黄子孙，也许并非夸张。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在改革时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这并未改变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局面。1981—1985年间，全球农村人口比重由55.3%降为48.1%，即下降7个百分点还多，而我国同期仅由80.2%降至

79.9%，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倘若这个趋势不改变，那么世界农民中大半为中国人的时代如果说尚未到来，也是为期不远，而中国人大半为农民的时代如果说将会过去，也是遥遥无期。据此而论的话，说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该不算十分片面吧！

因此，中国的农民研究应该独步于全球，这应该视为生存问题而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这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民研究必须走向世界。

在国外，“农民学”（Peasantology）一词作为术语产生于60年代；而作为一门学问，国外一般将其归源于本世纪初俄国民粹派学者A. B. 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在60—70年代之交，国际上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T. Shanin, *Peasant and Peasant's Society*, Oxford, 1987）。不管此说是否夸大，农民研究自那时以来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这种进展有其深刻的背景：

第一，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大批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国）获得独立，使“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不发达社会学”应运而兴。而“不发达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学的一种研究方式。

第二，大萧条、法西斯暴行与世界大战所展示的“现代病”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现代思潮在战后西方日益高涨。而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工业化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也有严重弊病。企图在两种“工业文明”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人日益增多。人们又想起了民粹派的呼声：“都市文明时代已过去了！”如果说“现代化”开始于对被中世纪农民文化所否定的古典城邦文化的重新发掘（文艺复兴），那么“后现代化”则唤起了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农民文化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日

益活跃的“绿色运动”更在抨击“过分工业化”的同时明确把“支持农民与农村社区所选择的结构模式”作为己任(FPH: Program 1992—1995, Paris, 1992)。后现代主义—新民粹主义与“绿色思潮”相呼应,成为推动西方农民研究的强大动力。

第三,本世纪以来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也呼唤着新一层次的理论概括;农民史、乡村社会学、民俗学、农业经济学等与农民相关的学科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古典城邦以工商立国,是奴隶制的天下,而中世纪则是庄园的世界,而现在人们发现古典城邦更大程度上是小农而不是工商业者和奴隶的集合;中世纪“庄园化”的程度也远非原先认为的那样大,因此,有必要重新估价“小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现代化大生产”将消灭小农的假设未被证实。不仅东方诸国“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西方诸国的工厂式大农场也未能战胜家庭经营的小农场,而南方诸国还出现了殖民时代的种植园在新的基础上走向小农化的趋势。显然,“小农”未来的前途也远没有人们曾经设想的那么灰暗。总之,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

这些背景今天仍在发展,它决定了农民学今后仍将是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前沿学科。今天,农民学作为对农民群体的全方位研究,正日益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与实践精神,“把众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农学家团结在一种共同的兴趣之中”,并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各种理论体系,其成果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上述诸学科的发展。这对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

国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它本身就凝聚着那一代有志者认识农民、改造农民的努力。共产党人与国统区左翼知识界(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前辈等)都对此卓有贡献。而当时的地政学院及农村复兴

委员会系统诸学者、“乡村建设派”人士、满铁庶务部研究人员与来华西方专家如卜凯等，也各有造诣，自成学派。建国后，“农民战争史”曾红极史坛，党政部门的对策性农村调研从未中断，改革中的农村更是举国、举世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民研究被分割为农经、农史、史学以及政策研究等互相脱节的诸部门，而且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大，与国际学界相隔绝，研究水平远不能令人满意。应当说，农民学在我国还处于开创期。

当然，我国农民研究的背景与国外有很大区别。别的且不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推进现代化，而不是“反思现代化”，仅此一点就会带来价值尺度的根本差异。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思想界曾经深受“现代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同样受到“后现代化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影响”即交流，交流决非坏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农民学某些流派的“乡村理想主义”（rural idealism）与“乡土中国的传统思潮”具有完全不同的土壤，轻易地互认“知音”未必可取。

另一方面，在经验层次上，中国农民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农民的差异犹如国内各时各地各层农民之差异或西方各国间农民之差异一样不可忽视。当然既同为“农民”，他们又必然有共性，因而别人的研究才能为我们所借鉴。但他山之石可攻玉，却不能代玉，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农民学流派，这套丛书就是为这个目的出版的。

本丛书兼收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与工具书类著作，其意不仅在于以有限的选题，尽可能容纳多维度的探索，而且在于农民学学风的建设。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短钉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乡土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的农民学

能走出那种“汉学—宋学循环”的陈套，实现理论与经验两种研究的现代认识循环。

本丛书译、著并重，并将逐步增加“著”的比重。第一批收入本丛书的几本译作都是有代表性的国外农民学名著，作为一家之言产生过很大影响。几本国人的专著反映了作者在农民学领域的可贵探索，是非长短正待后人评说。前者为攻玉之石，后者为引玉之砖，或攻或引，总为去瑕存瑜，渐图完璧；一砖一石，但求负重为基，奠我华宇。我们希望它们都能有助于构筑我国的农民学研究大厦，为我们这个农民国度的现代化事业略尽绵薄。

本丛书由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并资助出版，并邀请国内外农民研究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负责学术审定与编辑工作。在改革之潮中崛起的中农信公司以“中国农村发展”为己任，也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开拓为己任。她坚信神农之光永照华夏，中国农民的未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农信的将来，都将充满光明！

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

(代中译序)

秦晖

一、“恰亚诺夫热”

据说我们正面临一个“争‘后’恐先的时代”，“后现代……”、“后工业……”、“后城市……”乃至“后后……”之类的术语满天飞。与此相应地，“拿来主义”的译书潮中也是以“后”为尚，70—80年代的东西就已经被目为“过时”了。而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译著原作却出版于20年代，这值得“拿来”吗？

又据说现在是一个“东西”或曰“中西”碰撞的时代，不管是“西化”论、“中体西用”论还是“抵制西化”论，是“西学东渐”说还是“西方没落”、“东方复兴”说，总之为师为敌皆在“西方”。至于东西（或中西）间的俄罗斯，如今也有个说法，叫做“从‘以俄为师’变成‘以俄为鉴’”，如此晦气的俄罗斯，尚有值得“拿来”者乎？

然而别人在“拿来”恰亚诺夫著作时却似乎没有这种顾虑。作为本书主体的《农民经济组织》早在1925年以俄文版在作者的祖国问世前，就先于1923年在柏林以《农民经济理论》出了德文本，并立即在该国引起了一阵讨论。我们的东邻日本也“取经”心切，先后在1927年以《小农经济の原理》为题出版了从德文校译的日文本，1957年又以《农民农场组织》为题出版了直接译自俄文的日文本，同时还增补修订再版了德译日文本。这样，在30年间本书先后有三个旧译本问世，这在以善于“取经”著称于世的日本

也是不多见的。自 30 年代恰亚诺夫被捕入狱到 60 年代前，恰亚诺夫的著作一度处于相对地被人“遗忘”的状态。但即使在这段时间，他的影响也可以在西方学界的不少有代表性的成果中看出，如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①、格申克隆的欧洲后起国家“后来居上”现象的研究②、这一时期西方的农民问题研究，尤其是在这一领域被公认为处于此时期西方领先地位的荷兰学派对印尼农村的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二元社会”理论③、“合作制理论”④乃至“新经济史”的兴起等等。

1962 年第二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以“从欧洲农业史看(当代)不发达社会的农业问题”为主题。会上有人提出了“重新发现恰亚诺夫”，认为恰亚诺夫 40 年前提出的那些问题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甚至在苏联，他当年提出的问题也尚未了结⑤。结果反响强烈。在以后的几年里，“恰亚诺夫热”迅速升温，并从经济史蔓延至其他学科领域。1966 年，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和他更早期的论文《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1924 年以德文发表于柏林)，被西方三位农民学家：美国的 D. 托尼(当时执教于法国索邦—巴黎大学)、法国的 B. 克布莱(亦为索邦教授)与英国的 R. E. F. 史密斯(伯明翰大学)联合编辑为英译本；以《农民经济理论》的书名由美国经济学会出版。它与另一部众所周知的名著：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奠基作之一、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起构成《美国经济学会译丛》。这套译介非英语的“重要经济学经典”的丛书只此二本，原作在时人心目中的意义可想而知。由此开始，恰亚诺夫著作的译本在西方纷纷出现。1967 年，法国与荷兰各自出版了《恰亚诺夫选集》8 卷本；不久《农民经济理论》又有了西班牙文版；恰亚诺夫的另一名著《社会农民的基本思想与工作方法》继 20—30 年代已有德、日译本之后，也有了英、法、荷等译本；恰亚诺夫的文学体裁“农民未来学”著作《我的兄弟阿列克塞在农民乌

托邦国旅行记》于1976年先以专辑形式由英国《农民研究杂志》刊出，次年又出了英译单行本；1986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继美国经济学会之后又出了《农民经济理论》的第二个英译版。次年苏联正式宣布为恰亚诺夫及“组织—生产学派”的其他同仁平反昭雪，于是恰亚诺夫著作的单行本与多卷本选集、恰亚诺夫之子的回忆录与众多的研究、纪念著述也在苏联纷纷出版，“恰亚诺夫热”继20—30年代在德、日，60—70年代在欧美之后，又于80年代在他的俄罗斯祖国兴起。至此，恰亚诺夫的主要著作都已以世界各主要语种一版再版。如今，承萧正洪先生及同仁的努力，它的第一个中译本也问世了。

二、“农民的新马克思”？

谈到恰亚诺夫著作的意义，人们（包括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素养的读者）首先恐怕就会感叹于恰亚诺夫在本世纪初作出的许多“预言”之“应验”。尤其是经历了农村改革“奇迹”的我国读者，对于他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与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农业工厂”、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主要方式是“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都会有很深的感受。而他在《农民乌托邦》中描绘的“1984年”的景象，从“小城镇主义”、“离土不离乡”、合作社与乡镇企业现象、每户8—11俄亩的“责任田”上独立经营与非农产业的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以至家族温情与传统社会关系同现代理性化决策程序的结合等等，都足以令人惊讶。而农民经济与经济史的研究者对恰亚诺夫分析的一系列有别于现代理性经济原则的“农民经济”现象也会表示认同，诸如“工兴农荒”现象（农民打工并非因资本、土地不足，“民工潮”与乡村土

地利用率下降并存、“劳力过剩”与耕作粗放化并存)、“谷贵工贱”现象(谷价越高、工资越低这一从“经济理性”观点看来的“反常现象”)、“亏本经营”现象(当代经济史所争论不已的所谓“内卷化”问题)、农民经济决策的直觉经验、下意识与非逻辑思维性质、农民对使用机器是否“划算”的独特理解、农民经济中“地价为地租资本化”之不能成立,等等。这一切或者就在我们周围的现实农村中发生,或者存在于史籍中所见的过去。恰亚诺夫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深刻的。恰亚诺夫认为对农民农场的分析应从客位观察改为主位研究法,而这已成为当代文化人类学认同的方法论原则。恰亚诺夫关于农户家庭周期性变动的研究即所谓“恰亚诺夫循环”说,经60年代译介者“重新强调”后,立即对经济史中的新人口论产生重大影响,“几年内便发展为农民家庭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思想之一”^⑥。

但是,恰亚诺夫著作的最重要的价值当然还不在于此。社会科学毕竟不是诺查丹马斯式的“预言术”,与许多更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恰亚诺夫的话中未“应验”的毕竟比已应验的多得多。社会科学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连续过程具有积累性,人文研究应体现时代精神与超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结合,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从认知史或理智史的角度来看待恰亚诺夫。

在这方面,应该说60年代以来国际上学界的“恰亚诺夫热”中有许多评价是过甚其词的。仅从《恰亚诺夫与经济人类学》、《后马克思农民经济理论:恰亚诺夫学派》、《新民粹主义农民经济理论:恰亚诺夫学派》、《恰亚诺夫的使命:启蒙与当代发展理论》这些论著题目,就可知这种评价份量之重。当时的学术著作中出现了“恰亚诺夫的(chayanovan)”、“恰亚诺夫主义(chayanovism, chayanovist)”以及“农民主义(peasantism)”等词汇,人们认为恰亚诺夫的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农民学研究者”^⑦,它不仅“照亮了俄国历史的迷宫,特别是有助于澄清从十月革命

到全盘集体化之间的俄国农村历史主要时期的那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提供了一把理解一般农民社会的万能钥匙”，成为“适用于对当代世界农民进行一般性分析的结论”^⑧。更有甚者，它的影响还越出了农民学范围。正如《农民经济理论》英译第2版序言所说：“本书被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术门派的分析所广泛使用。它引起的误解与它的启蒙作用在效果上常常同样有意义”。“左派、右派、中派都引证此书，……恰亚诺夫被欢呼为农民的新马克思、创立激进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英雄，而旧的思想统治则以同样程度的仇恨攻击他。”本书影响所及，不仅使书中一些术语如“自我剥削”、“劳动辛苦程度”等等一度非常时髦，甚至进入了“经济学与非经济的当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语汇”，而且还“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吸引了各方的注意，不但为学界提供了似是似非的定义、分析模式、语言符号，还常常成为国家或国际间组织的政治纲领的基础”^⑨。

这样一种“热”是容易搅浑水的。实际上恰亚诺夫所做的只是一种学术工作。它的意义在于：

第一，恰亚诺夫的“社会农学”是当代农民学研究的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而且他的一系列见解是如此有生命力，以致至今他仍被认为是当代农民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实体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学派与农民研究中的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的综合物）的头号代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农民学（至少在西方）正是从60年代的“恰亚诺夫热”中奠定的。

第二，由于恰亚诺夫（确切地说，应该是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自治局农业工作者”以及最鲜明地体现这一群体活动特点的组织——生产学派）首先跳出了以“经济人”这一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分析其经济行为，同时首创大规模地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

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⑩的话，那么他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⑪的人。

第三，在社会—政治思想史上，“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的定义问题和恰亚诺夫是否算得上这些“主义”者的问题一样，是极为复杂与界定不明的。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定义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恰亚诺夫是那些既反对资本主义、又不赞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立志要寻求一条从农民社会传统到现代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人们中的佼佼者。当然他不是以政治方式、而是以学术思想理论的方式来寻求这条道路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我国的乡村建设派和新儒家运动颇有可比之处。

仅就这三点而论，把这本书译介过来就是非常值得的——虽然译介并不等于同意他的观点。

三、恰亚诺夫与俄国农民学传统

作为学者与思想家，恰亚诺夫的出现并不是个偶然现象。

俄罗斯是个后起的农业文明地区，在相当漫长的时代它的“农学”是十分落后的：像我国古代从《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到《农政全书》那样的悠久传统，或是像古罗马从加图、瓦罗到科路美拉那样的“农书”文化，古代罗斯是望尘莫及的。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开始了“追赶欧洲”的加速近代化过程，但那时俄国农业的主流是农奴制，农政人士所关注的只是贵族大地产的经营。16世纪的《家政学》（Домострой）^⑫通常被认为是俄国第一部“农书”，但其内容是如何经营大庄园，与小农毫不相干。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根本改观。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广大农民在形式上成了独立的家庭经济主体，“小农”问题顿时突出起来，并成了俄国现代化之路上的关键问题，受到知识界的极大关注。最初这种关注并不是纯学理

性的。俄国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曾试图发动农民的“直接行动”，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务人员、教师、经济学与统计学者纷纷离开城市“到民间去”，从事民粹主义的革命宣传。然而“民间”对他们的热情却报之以冷淡。80年代初民意党被镇压后，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告一段落。其参加者痛定思痛之后，一部分人转而寄希望于城市无产阶级，成了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另一部分人则痛感要改造农民俄罗斯，首先必须潜心了解、研究农民俄罗斯，于是他们纷纷进入俄国各地的地方自治局，形成了所谓“地方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群体，并开始了可能是有史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系统性的科学化实证化的农村调研与统计工作。

地方自治局是1861年改革后作为“新政”之一在省、县两级建立的半官方半民间机构，其职能是取代原先农民所属的贵族阶层而充当国家与基层农民村社间的中介，其中又以与农民交往更多的县自治局最为活跃。自治局议会由地主、市民与农民村社选出，通常为开明派贵族所控制，它聘任专家与志愿者从事兴学、筑路、卫生、土地整理、农技改革等工作，并进行有关的调研。自治局预算由国家拨款，而运作却属民间性质，其权限固然不能与代表专制国家的地方政权相抗衡，其研究却也一般不受后者的约束。虽然一般说来自治局的主流倾向是自由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但实际上其工作者中从保守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无所不有，不管“主义”只研究“问题”的也不乏其人。俄国农民问题的广泛性与尖锐性、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加上自治局这样一个经费充裕而空气自由的活动领域，使俄国的农民研究在这一时期空前活跃，学术遗产之丰厚、思想流派之纷陈、研究水平之不俗，均为当时世界各国所不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积40年之努力，“自治局学者”的成果已出版成书逾4000册之多，而且其中数据信息比重极大。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

资料库。

恰亚诺夫及其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恰亚诺夫生于1888年，青年时代是“田野工作者”——自治局土地调查员，后来师从著名民粹派学者、“预算统计学派”专家A. 佛图那托夫(1856—1925)教授，在非黑土地带的沃洛格达、莫斯科等省农村从事统计分析工作，著述渐多。1913年他年仅25岁时成为当时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科学院的副教授，当时他已有13种著作问世，成为第三代“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的天才代表，并与A. 切林采夫、H. 马卡罗夫等一起在与“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形成了组织与生产学派。不久他升为教授，并主持该院的农业经济政治高级研究班。就在此时迎来了1917年2—10月的大变革。在此期间他联合全俄自治局联合会及其他机构中的各种不同倾向的学者成立了土地改革联盟并任其执委会成员，积极研究土改问题。十月革命后他所主持的研究班改组为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恰亚诺夫继续任所长，并兼任苏俄政府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从事土地整理与合作化方面的组织工作，并对组织与生产学派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1930年，苏联发生“劳动农民党”冤案，恰亚诺夫与组织—生产学派的所有主要成员均被指控为这个虚构的“党”的头头而被捕入狱。42岁的恰亚诺夫从此离开了学术园地，并于1939年死于劳改营。

恰亚诺夫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20年的著述生涯中出版了60种专著，发表的论文更多得难以统计。在农民—农业研究中他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

(一) 国外农业研究，如《意大利农业合作制》(1909年)、《比利时农业信贷》(1909年)、《瑞士小农农业》(1912年)、《法国农业中的生产与消费》(1913年)等。

(二) 统计资料整理与调研报告，尤其是非黑土地带的农业统计，如《莫斯科省农民农场中货币项目的问卷调查集》(1912年)、